

如何认识当今中国的历史方位

胡鞍钢 张 巍

摘 要: 如果要从空间与时间、世界与历史相统一的坐标上标示出当代中国在世界发展大势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历史方位,可通过四个由远及近的视角对中国发展的时间轴进行分析:一是基于新中国成立至今 70 年的历史视角,重点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几个时期(子阶段)以及彼此的关系;二是基于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史视角,重点分析中国经济起飞的“增长奇迹”背后的逻辑;三是基于进入 21 世纪以后的历史视角,剖析中国如何利用战略机遇期完成从“全面赶超”到“全面超越”的目标;四是基于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历史视角,通过对比分析“新常态”与“老常态”梳理“习近平时代”承前启后的历史方位和继往开来的前进方向。

关键词: 历史方位; 发展逻辑; 四大视角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7.05.002

在驶向民族复兴彼岸的海面上,中国航船的经纬度也在不断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曾用“三个前所未有”和“三个重大危险”,来高度概括我国当前面临的双重历史环境。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在十八大以后的新发展阶段,我国现在正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方位? 面临什么样的环境和挑战? 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这都需要借助历史视角来帮助我们厘清认识。也只有充分认识中国当前发展方位和发展逻辑,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

一 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视角^①

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70 年的历史视角来看,中国处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迅速崛起期,目前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下半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更是深刻反思建国初期经济建设方面犯下“大跃进”等错误后对我国国情的高度凝练,包括了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两大要素。如表 1 所示,从阶段论来划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分为上下两个半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上半场”(即 20 世纪后半叶)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绝对贫困阶段,在极贫条件下打基础,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二是温饱阶段,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三是小康水平阶段,到 20 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下半场”,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前二十年的持续高增长(全面小康社会阶段)到 2020 年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基本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目标。二是后三十年的持续稳定增长(共同富裕阶段)构建共同富裕社会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延伸,也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到 2050 年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下半场,未来进一步发展目标包括人均收入进入高收入国家,迈向极高水平(HDI 大于 0.8),全面消除贫困人口,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低于 30%,新型工业化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地区差距进一步缩小,科技教育比较发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作者简介】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4);张巍(通讯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北京,100084)。

^① 本部分主要观点的展开及分析论证参见胡鞍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下半场与五个阶段》,《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2 期。

表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划分

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	“上半场”	第一阶段: 绝对贫困	1949—1978
		第二阶段: 温饱阶段	1978—1990
		第三阶段: 小康水平	1991—2000
	“下半场”	第一阶段: 全面小康	2001—2020
		第二阶段: 共同富裕	2021—2050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存在着发达因素与不发达因素、发动因素与限制因素、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等同时并存,长期存在相互竞争,此消彼长,相互转化的历史进程。具体而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从欠发达阶段走向中等发达阶段的过程;是全体人民发展能力、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历史过程;是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步下降,最终消除贫困人口的发展过程;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贫困到温饱,从小康到全体富裕,进而到更加富裕的发展过程;是由传统农业国,逐步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过程;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过程;是由文盲半文盲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比较发达的历史过程;是由人与自然之间的差距扩大到逐步变为缩小,进而人与自然和谐的长期过程;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过程。而随着这些方面的发展水平和发达程度完成量变到质变的转换,也就实现了从现有的子阶段向更发达的子阶段的跃迁。

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旧是最大的国情,但我们需要把握住初级阶段“变”与“不变”的核心:初级阶段的大判断、大周期、大趋势没有变,但所处的子阶段有变化,子阶段的矛盾有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旧是主要矛盾,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从生产规模与人民物质文化需求的不匹配(即规模不匹配),转向了生产质量与人民物质文化需求的不匹配(质量不匹配)。这既是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逻辑基础,也是从温饱社会迈入小康社会,进而向共同富裕社会前进的国情使然。同时,由于社会发展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连续过程,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一些矛盾特征也会在初级阶段的下半场逐步显现,比如中国现在已经具备诸如后工业化、人口老龄化、服务业现代化等发达社会的特征。这就必然要求我们的发展理念从过去单一的经济现代化升级到五位一体的现代化,从局部现代化到全面现代化,从物质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即“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就是“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二 改革开放 40 年的视角

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近40年的历史视角来看,中国仍处在发展的黄金时期,创造了世界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人口规模最大、消减绝对贫困人口最多的历史纪录。如表2所示,对比全球几大主要经济体经济起飞的主要指标,美国经济起飞时间最长,保持了43年的较高增速,而我国从1978年到2016年已经维持了38年高增速,超过美国保持的纪录指日可待。日本在1950到1973年的23年时间内维持了9.3%的高增速,被称为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奇迹,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近40年,以本币计算的GDP增速为9.6%左右,不仅超过了日本的增速,而且维持了更长的增长时期。中国经济起飞时的人口规模高达9.6亿人,超过另外三国,人均GDP仅为645美元,低于另外三国。可以说中国在比另外三国更差的先天基础上取得了更好的增长成绩,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而且中国的经济起飞阶段仍未结束,经济奇迹仍在持续。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表 2 四国经济起飞主要指标比较

指 标	美 国	日 本	中 国	印 度
	(1870—1913)	(1950—1973)	(1978—2015)	(1990—2015)
总人口(万人)				
初期	4 024	8 381	96 259	87 062
终期	9 761	10 871	137 462	131 100
增长率(%)	2.1	1.1	1.01	1.65
GDP 总量(百万美元)				
初期	98 374	160 966	616 886	154 400
终期	517 383	1 242 932	18 610 000	751 200
增长率(%)	3.9	9.3	9.6	6.5
人均 GDP(美元)				
初期	2 445	1 921	645	1 773
终期	5 301	11 433	13 572	5 730
增长率(%)	1.8	8.1	8.60	4.80
GDP 占世界比重(%)				
初期	8.8	3	4.9	3.3
终期	18.9	7.8	17.2	6.9
增长率(%)	0.23	0.21	0.33	0.14
商品出口依存度(%)				
初期	2.5	2.3	4.59	6.9
终期	3.7	7.9	20.59	12.75
增长率(%)	0.03	0.24	0.43	0.23
非农业产值比率(%)				
初期	79.5	77	71.8	71.0
终期	83	94	91.1	83.0
增长率(%)	0.08	0.74	0.52	0.48
城市化率(%)				
初期	19.8	43.1 ^{**}	17.92	25.5
终期	45.6 ^{***}	55.4	56.10	32.7
增长率(%)	0.65	0.49	1.03	0.29

数据来源: 美国和日本总人口、GDP、人均 GDP(1990 年国际美元) 数据均来源于: 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8 AD*; 非农业产业比重数据来源于 B.R. 米切尔编, 《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 》(第四版) , 贺力平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中国和印度总人口、GDP、人均 GDP(2011 年国际美元) 、城市化率、非农业产值比率、商品出口依存度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 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通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经济起飞。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包括三个主要方面: 一是引进市场机制, 极大优化了要素配置的效率, 极大降低了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 二是改革计划经济手段, 改善宏观调控能力,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 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十几亿人民的全面创新, 这不仅包含引进吸收全世界一切先进发达的事物, 还包括对诸如包产到户等本土首创的尊重和

对试点经验的推广。正如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的那样,这的确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在中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大创新和成功是诸如“十三五”规划、国家专项规划等凝聚了13亿人民的共识,具有宏观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国家战略规划,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并通过由轻工业到重工业、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升级,最终实现了社会经济从高储蓄社会向福利社会发展迈进。

具有务实开拓性、积极建设性而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我们国家在新时期空前活跃起来,快速发展起来,日益繁荣富强起来。不到40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并在这30多年内走完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数百年才能完成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道路。同时也需要看到,中国经济起飞奇迹虽然还在持续,但在迅速现代化的过程中,积累了各种深层次问题,比如人与自然的矛盾、经济结构性矛盾、民生领域欠账问题……并且,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①目标还有差距。无论是解决“发展病”问题,还是实现更高水平的奋斗目标,都需要全面深化改革。也只有通过改革化解包袱,才能让中国经济轻装上阵,延续辉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将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凤凰涅槃的决心,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把改革进行到底。^②

三 进入新世纪近20年的视角

从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近二十年历史视角看,中国即将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提出2020年百年目标,是江泽民、胡锦涛两代领导人在对小平同志“三步走”战略和“小康目标”进行历史性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与时俱进的发展。具有方向的一致性、战略连续性、步骤阶段性等特征,避免了“大跃进”式的大起大落,也避免了外部冲击(如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按部就班、稳扎稳打地实现原定战略目标。进入21世纪,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准确的判断:“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③这一战略机遇期的核心目标就是“富民”,即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受益于2000年以后成功把握和充分运用了战略机遇期,中国完成了从“全面赶超”到“全面超越”的大追赶。

而实现从“全面赶超”到“全面超越”这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大体又可以分为前十年(2001—2010年)的加速追赶、全面接近和后十年(2011—2020年)的此消彼长、全面超越的两个过程。进入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依然保持了经济高速增长,在加入WTO之后,按照市场经济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完善对外开放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国际经济合作,并通过正式实施“走出去”战略加速了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和一体化。在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又率先完成经济复苏和贸易复苏,加速缩小了与美国各方面的差距,中国充分利用了这一战略机遇期,拥有了更加有利的国际地位,获得了更加广大的国际空间。这是中国加速追赶,全面接近美国的十年。从综合国力对比看,到2010年,中美之间综合国力已经基本持平^④。后十年全面超越,则反映了国际竞争中“不进则退”的残酷铁律。首先是作为我们赶超对象的美国,经济始终无法走出次贷危机后的低迷,而且阿富汗、伊拉克泥潭和数量庞大的海外基地继续大量吞噬美国财政,制造业空心化导致

①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

② 《G20杭州峰会成果系列述评:中国向世界宣示坚定改革决心》,新华社2016年9月21日电。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9/21/c_1119599432_2.htm

③ 《中共十六大报告》2002年11月8日。

④ 数据来自胡鞍钢、高宇宁、郑云峰、王洪川《大国兴衰与中国机遇:国家综合国力评估》,《经济导刊》2017年3月。

美国出现了以逆全球化为竞选口号的特朗普上台。而中国经济继续稳中求进地保持较高增速,通过简政放权、供给侧改革、精准扶贫、新业态新产业的培育持续释放改革红利,最终实现综合国力的全面超越。

实际上,早在1977年邓小平同志就前瞻性地提出创造23年(指1977—2000年)的国际和平环境设想,中国也从1978年开始进入历史上极其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时代。到1987年,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延伸为“70年国际和平论”,即中国需要从1980年到2050年这70年的长期和平国际环境,实现“三步走”战略。目前我们已经争取了35年的战略机遇期,应该再争取余下35年的和平环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估量战略机遇期不可避免需要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进行全面、综合把握,但也应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本身在影响全球局势方面的“权重”越来越大:即,在深刻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外交等战略格局相互交织的各因素中,中国分量在加重,并且越来越重。尽管来自国际国内的压力挑战层出不穷,但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已经实现较好较快发展、中国还将“稳中求进”地持续发展,这不仅将深刻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成为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中国锚”。而且反过来,又能成为我们争取35年甚至更长战略机遇期的根本立足点。

四 十八大以来的视角

从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视角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阶段。所谓新常态,就是我国经济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就会有新的发展特征、新的发展动力和新的发展趋势。我国已经完成从中中等收入到中上等收入、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从加快发展到科学发展再到“稳中求进”,并从增长数量到增长质量、从增长速度到增长效益升级,实施了从五位一体到六位一体以及党的建设,从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到五个全面战略部署,正从世界大国走到世界舞台中心。这就需要新的发展思路、发展政策,“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再上一个发展新台阶。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总体基本方向没有变,既有“时”(仍处在战略机遇期),又有“势”(仍处在全球上升通道);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既有动力,也有压力。但是有利条件多于不利条件,机遇大于挑战,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

表3 新常态和老常态的比较

	老常态(1.0版本)	新常态(2.0版本)
发展时间	1978—2010	2011—
发展阶段(收入水平)	低收入—中下等	中上等—高收入
发展阶段(HDI)	低人类发展水平—中人类发展水平	高人类发展水平—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	绝对贫困(>60%)—温饱(50%~60%)—小康(40%~50%)	富裕(30%~40%)—更富裕(<30%)
经济增长速度	高速增长(9.9%)	中高速增长(6.5%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	高速增长(11.5%)	中高速增长(7%左右)
人口结构	人口红利上升,人力资源红利增加	人力资源红利增加大于人口红利下降
增长动力	要素驱动、投资为主、劳动力资源	创新驱动、有效投资、人才资源
GDP生产结构	工业主导、服务业为辅	服务业主导、工业为辅
GDP需求结构	投资为主、消费为辅	消费为主、投资为辅
就业结构	农业劳动力为主(2002)、农村劳动力为主(2013)	非农业劳动力、城镇劳动力为主

续表

	老常态(1.0版本)	新常态(2.0版本)
人与自然	差距扩大,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上限	生态文明建设,从生态赤字到生态盈余
中国与世界	经济总量从世界第10位到第2位(汇率法),贸易从世界第29位到第2位;发明专利申请量超过美国(2010);世界大国	世界第一大贸易体(2013)、第一大经济体(PPP,2013),高技术产业增加值(2015);工业增加值超过美国(2011);发明专利授权量超过美国(2016);最大发动机;世界强国

从增长动力来看,未来将仍然依靠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拉动经济增长。从增长需求来看,消费需求将大于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又更多体现了有效投资和长期投资的需求。从增长来源看,要素投入特别是投资增长率有所下降,无论是技术创新、供给创新、市场创新,还是劳动力和人才培养竞争转移流动,都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增长效率来看,经济体制改革都会有效地改进各类要素特别是土地、资源、资本等的配置效率。从增长效益来看,不仅促进了经济效益,而且还促进了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的提高。概言之,所谓“中高速增长”就是“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速度,实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速度”。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在世界经济海洋中“劈波斩浪”的经济巨轮,中国的发展具有惯性。创新具有惯性,改革也具有惯性,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也必然有惯性。这种惯性会导致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维持较长时间的较高增速,进而在增速换挡中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升级,最终实现轻装上阵、再上一个大台阶的目标。同时,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舞台中心,必然要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践行者、引领者,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崛起也同时宣告着殖民主义时代、霸权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结束。这对于打破长期以来美国独霸世界、西方主导全球的政治经济贸易格局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对于促进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具有十分积极的国际意义。

五 结 语

回顾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砥砺奋进、锐意进取的路线图:1949年,5亿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一起站起来;1978年,成为世界第十大经济体,10亿人民一起改革开放富起来;2000年,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12亿人一起建设小康社会。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不断强化现代化因素、社会主义因素、中国文化因素的过程,仍然是不断发挥后发经济优势、社会主义政治优势、中国文化优势的过程。“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①

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中国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也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既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半场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战略机遇时期,也处在第一个百年目标胜券在握、第二个百年目标征程徐徐开启的时期,更处在国际“新全球化”和国内“新常态”的大格局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否能够实现,关键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人民在新形势下的认识、作为和担当。全面审视和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这“两个大局”的发展大势,全面体察和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并且更加奋发有为、兢兢业业和因应得宜,我们就一定能继往开来,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

(责任编辑 刘晓虹)

^① 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链接: http://www.gov.cn/ldhd/2013-04/07/content_2371801.htm

Abstracts and Keywords of Major Articles

A New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Policy of the Disbandment of Tribes and the System of Authorized Tribal Chiefs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by MOU Fa-song)

Abstract: After the Former Qin Dynasty conquered the state of Dai, the tribal union under the surname of Tuoba was disbanded. This policy adopted by Emperor Daowu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was actually learned from the Former Qin Dynasty, which aimed to divide the tribal union into smaller tribes and integrate them into the national system of the Northern Wei. However, the tribal institution as well as the domination of tribal chiefs remained. These tribal chiefs were authorized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In fact, this practic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Sixteen Kingdom Period.

Keywords: Northern Wei Dynasty, Sixteen Kingdom Period, disbandment of tribes, authorized tribal chiefs, origins of a system

How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oday's China?

(by HU An-gang & ZHANG Wei)

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oday's Chin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when taking the whole spatio-temporal picture of the world and history into consideration, we can analyze the time axis of China's development from four angles of different terms. Firstly, we analyze the several periods at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nd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new China. Secondly, we can focus on the logic behi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in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irdly, we can examine the transition of China's strategic goal from "all-side chasing and surpassing" to "all-side transcendi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Fourthly, we can study the transitional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the orientation of forging ahead in "XI Jin-ping Era" after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by comparing the "New Normal" with the "Old Normal".

Keywords: historical position, logic of development, four angles

The Economic New Normal and the Great Logic of Development: Intellectual Origins and Economic Innovations (by QUAN Heng)

Abstract: The Economic New Normal, as an important claim in XI Jin-ping's economic theory, formulates the great logic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It demonstrates the profound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f China's economy on the one hand and its current feature and strategic choice on the other. In the New Normal, China's economy will keep the middle and high speed in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 the developing momentums so as to successfully surpass the "middle-income trap" stage and forge ahead towards a high-income economy. The Economic New Normal, as well as its new surpassing mode of development, i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linear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icating the dualism of overall surpassing and structural excellence of a post-surpassing economy and the feature of quadratic surpassing. With its innovation, the Economic New Normal ha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at of surpassing mode.

Keywords: Economic New Normal, great logic of development, new surpassing type of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n development theories

Memory Studies in Modern Philosophy

(by YANG Qing-feng)

Abstract: The fire of memory goes out in the stove of philosophy. Methodologically, philosophy still takes reflection and description that Bergson and Husserl used more than 100 years ago as its method, whereas the new methods in the disciplines of history, psychology and neuroscience have achieved plenty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erms of theory, in these fields new concepts such as social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historical memory and cross-cultural memory emerge continuously, whereas in philosophy no effective ideas have been put forward except memory types. In terms of practice,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memory such as various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memory material exploration and memory experiments have been carried out at multiple levels in those fields, whereas in philosophy no similar activit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Such a situation is due to the internal factors of philosophy: the strong tradition of seeking knowledge and truth makes it ignore the issue of memory. To re-ignite the fire of memory in philosophy, we should return to the phenomena of memory themselves, exploring the constitution of memory experience and constructing the philosophical starting point of memory research.

Keywords: memory, experience,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